

郑和与中马关系史

孔远志

Abstract

In many ways, the Ming dynasty navigator Admiral Zheng He symbolized the enduring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stat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especially Melak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played by the admiral's voyages on the bilateral China-Malaysia relations and the effects of these historical events that are still relevant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The paper consists of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examines Zheng He's voyages to Melak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olitical relations. Part two describes visits to China by some of Melaka's sultans, followed by part three highlight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visits of the Ming fleet on China-Malaysia relations. The next section delves into some of the legends and folk beliefs in Melaka that were linked to the admiral including historical relics and the legend concerning the marriage of Princess Hang Li Poh to one of the sultans. The final part points out the lessons that may be learned from the "spirit" of Zheng He's remarkable voyages and visits.

明初郑和的船队历经“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鲸波接天，浩浩无涯……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在七次下西洋期间，郑和为世界的航海事业、为中国与各国的友好合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孔远志 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印尼—马来语教研室教授。北京大学外文楼，北京 100871。E-mail: kongyz@pku.edu.cn

马来西亚人民热爱和崇敬郑和。1969年马来族学者 Harun Aminurrashid 出版过 *Peristiwa Laksamana Cheng Ho ka-Melaka* (郑和将军访马六甲), 除马来族学者外, 华族学者林源瑞(无出版日期)、沈墨义(1984)、李业霖(1984)、赖观福(1984)等都写过有关郑和与满刺加的文章。

1997年8月17日“郑和下西洋文物展”在吉隆坡正式开幕, 后又在新山、怡保、檳城、双溪大年 and 瓜拉丁加奴等城市巡回展出, 展览团还两次访问马六甲, 全部活动遍及六个州, 约占半个马来西亚, 展出至9月10日结束, 前后三周。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举办郑和纪念巡回展, 展览会展品之丰富、规模之宏大, 影响之深远, 在纪念郑和活动史上也是空前的。如今, 马六甲又兴建了中国本土以外的第一个郑和博物馆。

这份研究从历史的角度出发, 看郑和下西洋在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双边关系里所扮演的角色。

一、郑和与满刺加

郑和对马来半岛的访问中, 五次驻节满刺加(即马六甲)。明朝与满刺加王国的亲密关系成为中国与马来西亚关系史上的光辉一页。郑和船队还访问过当今马来西亚的彭亨、急兰丹(即吉兰丹)等地。在郑和航海图上还列有今属马来西亚的丁加奴、九州(Pulau Sembilan)、斗屿(Pulau Tenggol)和龙牙交椅(即浮罗交怡岛 Pulau Langkawi)等地名。不仅在满刺加, 而且在马来西亚的其他地方也保存着有关郑和的遗迹和传说。例如在瓜拉丁加奴、檳榔屿和砂劳越, 都有三保公(郑和)庙。

满刺加在1400年前后建国。其邻国暹罗恃强凌弱, “令其岁输金四十两, 否则差人征伐”。永乐元年(1403年)十月, 中国明朝永乐皇帝遣中国尹庆出使满刺加, “赐以织金文绮, 销金帐幔诸物”, “宣示威德及招徕之意”(马欢1451)。为此, “拜里迷苏刺(Parameswara)大喜, 遣使随庆入朝, 贡方物”(《明史》, 卷325)。满刺加表示归附明王朝, 意在依靠明王朝摆脱暹罗的控制。明王朝对满刺加无领土野心, 而且在朝贡关系中, 臣属国得到的赏赐往往比朝贡之物更贵重。

1405年趁满刺加使者来京，永乐皇帝诏封拜里迷苏刺为国王，赐以诰印、彩币、袭衣、黄盖，并应使者要求，亲制碑文题诗，立满刺加西山之上（永乐时期，受到明帝御书题赐的只有满刺加、日本、渤泥和柯枝四国，满刺加是第一个）。御书中还有八句诗（《明成祖实录》，卷47），颂扬中国与满刺加的关系，祝愿两国子孙后代永远友好。诗曰：

西南距海中国通，输天灌地亿载同。
洗日浴月光景融，雨岩露石草木浓。
金花宝钿生青红，有国于兹民俗雍。
王好善义思朝宗，愿比内郡依华风。
出入遵从张盖重，仪思杨袭礼虔恭。
大书贞石表尔忠，尔国西山永镇封。
山君海伯翕扈从，皇考陟降在彼穹。
后人监视久益隆，尔众子孙万福崇。

永乐五年（1407年）满刺加使者来华告状，“诉暹罗强暴，发兵夺其受朝廷印诰，国人惊骇，不能安生”（《明太宗实录》，卷72）。为了维护东南亚的和平，也为了不辜负满刺加对中朝的信赖和期望，明王朝一方面诏令暹罗，命其归还满刺加所受印诰，希其“自今安分守礼，睦邻境”（《明太宗实录》）。

另一方面，在永乐七年（1409年）遣郑和再次出使暹罗和满刺加进行调解，后暹罗遣使向明王朝“谢罪”，从而它与满刺加的这次争端获得妥善解决。郑和就在这第三次下西洋期间，受命为满刺加王拜里迷苏刺再次册封。“是后暹罗莫敢侵扰”（马欢1451）。这次郑和赴满刺加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今吉隆坡“马来西亚博物馆”的大门两侧用彩色瓷砖建成的围墙上，有“马来西亚历史沿革图”，第一段画面就展现1409年郑和船队到达满刺加的盛况。画面上的宝船悬挂“郑”字大旗，还有“1409”的明显标记。那一年是郑和首次驻节满刺加。¹ 1409年郑和访满刺加，是马中友好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宣德六年（1431年）满刺加使者巫宝赤纳等三人来北京向明宣宗（永乐皇帝已在1424年驾崩）诉暹罗又欲侵满刺加，“乞朝廷遣人谕暹罗王，无肆欺凌，不胜感恩之至”。当时郑和正值准备第七次下西洋之际，明宣宗让巫宝赤纳等搭乘郑和宝船回国，同时命郑和去暹罗向其国王赉谕。“责以辑睦邻封，毋违朝命”（《明史》，卷325）。这次郑和为调解暹罗与满刺加的紧张关系，花费了一月之久，终于圆满完成任务。

这次满刺加使者巫宝赤纳等三人是潜附在苏门答腊刺贡舟中来京的，以避开暹罗的阻拦。他们没带任何贡物。礼部称，若给他们赏赐，事无先例。明宣宗旨曰：“远人数万里外，来诉不平，岂可不赏？”遂赐“宁丝袈衣彩币表里绢布及金织袈衣有差”（《明宣宗实录》，卷76）。由此可见，明王朝看重的是他国对中朝的敬重与信任，至于能获得什么贡品，甚至因故没带贡品，是不予计较的。

反过来，满刺加国对郑和下西洋给予了大力支持。郑和船队每次出使西洋人数近三万人，历时一年半以上，装带的物资很多，仅船员口粮就需数十条大船运载。为了便于远航，经满刺加王国同意，船队将满刺加作为航行途中的一个中转基地。据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所撰《瀛涯胜览》称：

凡中国宝船至彼（指满刺加），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廩。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

显然，满刺加在郑和下西洋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中转站和候风等候站。这一事实既反映了满刺加在当时东西方贸易和交通中的重要性，也体现了明王朝与满刺加王国之间的亲密关系。在郑和下西洋期间，马来半岛上除满刺加王国外，还有彭亨、柔佛和吉兰丹等国也和明王朝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在七次下西洋中，郑和每次都访满刺加。在第四次下西洋期间（1413-1415年）郑和访问彭亨和吉兰丹。明史载，永乐九年（1411年）彭

亨王巴刺密琐刺达罗息泥遣使人贡。十二年（1414年）和十四年（1416年）复贡（《明史》，卷325）。《明史》还载，在永乐九年（1411年）吉兰丹王麻哈刺查苦马尔遣使朝贡（《明史》，卷326）。1412年，郑和受命奖吉兰丹王锦绣、纱罗、彩帛（《明史》，卷326）。

二、满刺加诸王访华

从永乐九年（1411年）到宣德八年（1434年）间二十三年中，满刺加国王祖孙三代前后五次到中国访问。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永乐九年（1411年）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率妻及陪臣五百四十余人随郑和来华。五百多年前一个国家的三任元首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如此频繁地访问另一国，出访的人员又如此之多，这在世界各国关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明王朝对满刺加国王的来访十分重视。当获悉拜里迷苏刺一行已入境，明成祖立即遣官员前往设宴接风，以示慰劳。后又命在会同馆安排好接待满刺加贵宾的下榻处。拜里迷苏刺抵京后，明成祖在奉天门设宴为他洗尘。并命礼部赐王金绣裘衣等。在永乐九年（1411年）7月15日至9月15日拜里迷苏刺访华期间受到明成祖的多次宴请。在9月15日的告别宴会上，明成祖赐敕慰勉，曰：

王涉海数万里至京师……朕与王相见甚欢，固当且留。但国人在望，宜往慰之。今天气向寒，顺风南帆，实维厥时。王途中强饮食，善调护，副朕眷念之怀（《明成祖实录》，卷78）。

明成祖的赐敕中，依依惜别之情溢于言表。同时，明成祖又分别赐拜里迷苏刺及其王妃、子侄和陪臣贵重礼物。给拜里迷苏刺本人就有玉带、仪仗、鞍马、黄金、白金、钱、钞、锦绮、纱罗、绢、浑金文绮、金织通袖等。

永乐十二年（1414年）拜里迷苏刺之子母干撒于的儿沙来朝，以父歿报丧。永乐十七年（1419年）亦思罕答尔沙（即母子撒于的儿沙）再次来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亦思罕答尔沙驾崩，但满刺加与中国的亲密

关系依然不断发展。西里麻哈刺以父歿嗣位，率妻子和陪臣来朝。宣德八年（1433年）九月他又带领妻子、陪臣及其弟来中国。除了上述提到的满刺加国王祖孙三代在二十三年间先后五次访华外，还应该指出的是，自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遣使尹庆抵满刺加，至1510年，在这一百余年间，满刺加国王、王妃和重要使者访华至少有22次之多。明朝廷则有十次遣特使赴满刺加完成诸项重要使命。由此可见，中国与满刺加的关系是何等亲密。但是，由于1511年葡萄牙侵占了满刺加，中满两国的亲密关系遭到破坏，被迫中断。

三、中马友谊的光辉一页

中马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公元一世纪班固撰写的《汉书·地理志》记载了中国到印度的海上航路，马来半岛附近是该航路的必经之地。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出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三世纪的中国秦、汉时期的陶器残片，（简斋1960）它证明《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可靠性。

公元三世纪时中国使者康泰、朱应出访南海诸国期间，曾访问过马来半岛上的耽兰洲（吉兰丹的哥达巴鲁一带）²、蒲罗中（柔佛一带）³、乌文国。⁴ 公元五至六世纪，丹丹（吉兰丹）⁵、盘盘（位于马来半岛北部）⁶、狼牙修（Langkasuka，位于马来半岛北部，包括今吉打州）⁷等国曾多次遣使至中国南朝的宋、梁（《梁书》，卷54）。

七世纪隋朝遣使常骏等出访赤土国（吉兰丹）⁸，国王特派三十艘船到国境迎接、导航，航行一个多月才到达其国都（旧吉打）（《隋书》，卷82、卷3）。常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马来半岛派出的专使。十三世纪宋朝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十四世纪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分别记载了蓬丰（彭亨）、吉兰丹、登加侬（丁加奴）等国的情况。

十五世纪初，郑和船队访问马来半岛的满刺加等国和满刺加诸王频频访华，是中马友好史上的光辉篇章。不论对满刺加，还是对中国，它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捍卫满刺加的独立，使其免遭暹罗的欺凌，从而有利于东南亚的和平与安定。

二是满刺加为郑和船队远航提供了中继站和等候季风的良港，这是郑和七下西洋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

三是通过朝贡、回赐以及贸易等途径，在经济上互通有无。例如满刺加提供的物品中有各种珍贵的香料，中国则供给享誉世界的丝绸、瓷器等，使两国人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贸易上互相给予优惠，例如《明会典》卷一百十一载：“使臣人等进到货，例不抽分，给与价钞。”即包括满刺加在内的外国来华贸易享有免税待遇。而满刺加对于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则免于征税（温斯泰德 1974）。

四是促进了两国友谊与文化交流。其中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巩珍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都详细介绍了满刺加国。例如马欢《瀛涯胜览》载：“（满刺加国）国王国人皆从回教门，持斋受戒诵经。”可见十五世纪初伊斯兰教在满刺加就成为当地王室和臣民普遍信奉的宗教。费信《星槎胜览》载：（满刺加国中）“男女椎髻，身体黑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这表明当时满刺加已有中国人或其后裔。此外，巩珍还介绍了彭亨国。这些都是了解十五世纪马来半岛历史的珍贵资料。

五是数万郑和官兵多次访问满刺加，不可避免的是其中部分人员与当地妇女通婚，繁衍后代，从而密切了华族与马来族的血缘关系。

四、关于郑和的动人传说

在马来西亚流传着许多有关郑和的动人传说。如“马六甲三保井”的遗迹（据传该井为当年郑和所掘，供其部下饮水），“郑和在槟州巴都茅渔港留下的脚印”的传说，“郑和护送汉丽宝公主远嫁马六甲国王”的故事，以及“三保鱼”的传说⁹等等。下面我们介绍和分析一下“郑和护送汉丽宝公主远嫁马六甲国王”是怎么回事。

在十七世纪的马来古典文学名著 *Sejarah Melayu*（《马来纪年》）上，记载着“中国公主汉丽宝与马六甲国王结亲”的故事。马来西亚民间还长期流传着“郑和护送汉丽宝公主远嫁马六甲苏丹”的说法。不少马来西亚朋友把这一故事看作历史事实。例如马来西亚《星报》（*The Star*），于 1995 年 11 月 25 日明确指出：“是郑和将汉丽宝公主护送到马六甲的”。¹⁰

中国史书上载有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时入宫的王昭君自请嫁匈奴的事，载有七世纪唐朝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联姻一事，还载有八世纪金城公主与吐蕃赞普弃隶缩赞结亲的事实。这证明：在中国，公主（甚至宫中女子）远嫁他族首领或他国国王，是一件大事。中国史书上通常都加以记载。何况汉丽宝的故事发生在十五世纪，当时的史书关于中国与马六甲关系的记载又十分详尽，可是明朝及其后来的史书都没有提及过汉丽宝公主远嫁马六甲国王的事件。因此，汉丽宝是明王朝公主的可能性极小。至于“郑和护送汉丽宝公主与马六甲苏丹成亲”，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郑和卒于1433年，而《马来纪年》上娶汉丽宝的苏丹曼苏尔·沙在位时间为1456至1477年。郑和在这位马六甲国王登基前二十多年就已经故世，怎么可能护送汉丽宝远嫁于曼苏尔·沙呢？

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有汉丽宝嫁给马六甲苏丹曼苏尔·沙的可能性。在马来语中“Putri Cina（中国少女）”以“皮肤白皙和美貌俊俏”著名。从马六甲的通婚历史看，汉丽宝很可能是马六甲华人与当地马来人成亲后生的女儿。因为早期中国移民几乎都是单身男子，中国女子随丈夫移居海外一般始于十九世纪末。

这里需强调的是，我们应该看到汉丽宝的故事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第一，它反映了一个重要史实，即早在十五世纪马中两个民族就亲密相处。马六甲在争取和捍卫独立的斗争中得到明皇朝的大力支持。自永乐九年（1411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马六甲国君祖孙三代前后五次访华，每次都受到明朝皇帝的隆重接待。汉丽宝公主的故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倘若没有这种亲密关系，故事里描述的“中国皇帝将汉丽宝公主远嫁于马六甲国王”以及“马六甲国王乐于娶中国公主为妃”，都是不合情理的。《马来纪年》作者撰写上述动人的汉丽宝故事，希望通过两国王族结亲联姻，加强马中的关系，这种美好的愿望是值得称道的。

第二，故事展现了五百多年前马来族与华族（或其后裔）通婚的社会现象事实。正如马来西亚《中国报》社论（1984年12月22日）称：“苏丹满速沙与中国新娘汉丽宝之间的异族比翼连理，含有巫华（即马来西亚的马来族和华族——引者）两族亲善的历史渊源。”显然，汉丽宝的故事

也有利于促进马来西亚各族间的和睦与团结。

这类民间传说究竟是否是历史事实，有待于考证。¹¹但它至少反映了当地人民对郑和的敬仰与爱戴。我们应该严格区分史实和传说，同时充分肯定传说的社会意义。从“郑和护送汉丽宝公主远嫁马六甲国王”的传说中可以看到，马来西亚人民赞美郑和，把他看作和平友好的使者。而西方殖民者来到亚洲，完全是为了掠夺和侵略。明朝1617年的《东西洋考》载，满刺加人民把葡萄牙殖民者与龟龙（鳄鱼）、黑虎并列，同为三害（张燮1981）。两者相比，爱与憎，何等鲜明！褒与贬，天壤之别！

五、弘扬郑和精神

弘扬郑和精神，首先要坚持在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十五世纪上半叶中国与满刺加的亲密友好关系是与郑和的功劳密不可分的。中马两国人民及其领导人都十分珍惜两民族间的传统友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于1994年11月访问马来西亚，在吉隆坡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的欢迎宴会上，他说：“中马友谊源远流长。五百多年以前，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五次驻节马六甲，同当地人民结下深厚友谊，传为历史佳话”（《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11月11日）。江主席在马六甲与马六甲州元首会晤时，又说：“早在明朝时期，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其中五次驻节马六甲，与当地人民结下深厚友谊，构筑了中国通向东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中马之间的这种友好关系一直延续至今”（《人民日报》，1994年11月13日）。

1994年马来西亚一位领导人访华期间，8月30日特地去南京瞻仰郑和墓，并亲笔题字。这位领导人的题字是：“向伟大的郑和致意——为了持久的马中友谊”。1997年8月17日郑和纪念展在吉隆坡开幕时，这位领导人亲自剪彩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郑和当年率领强大的海军远航是为了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郑和曾多次对马六甲王国进行友好访问。如果换成西方国家，马六甲早被侵占。他强调说，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强大不会对马来西亚或其他国家带来威胁。马中友好源远流长，这种关系必须进一步加强。他还说，郑和是一位伊斯兰教徒。郑和去世后获

得中国政府的厚葬，这表明中国尊重伊斯兰教。他指出，由于西方的鼓吹，过去人们一提起航海家，就不约而同地想起哥伦布，其实郑和也是一位杰出的航海家，当年郑和船队的规模远远超过八十七年后的哥伦布的船队。这位领导人还号召，在马来西亚不仅华族，而且马来族、印度族都应来参观这个郑和纪念展。

正当西方某些别有用心者鼓吹“中国威胁论”时，马来西亚领导人结合郑和下西洋，再次强调中国的强大不构成对马来西亚和其他同家的威胁，这对加强马来西亚（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友好、维护世界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弘扬郑和精神就要学习郑和勇于开拓、艰苦奋斗。郑和战狂风、劈恶浪，七下西洋，敢为世界先。这也是教育年轻一代的珍贵教材。马六甲的宝山亭位于三保山西南山麓。当年郑和曾在此山附近建船坞和仓库。后华人称这座山为三保山。几百年来三保山被作为华人的坟山，山上有一万两千五百多座坟墓。马六甲华人学者林源瑞写道：“三保山不仅见证了我们的华裔披荆斩棘、参与垦荒、建国立国的辛勤劳迹，也见证了我们的先辈，为了捍卫这块土地，同入侵的殖民主义者和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英勇牺牲的壮烈史实”（见林源瑞（无出版日期），孔远志 1990）。

第三，弘扬郑和精神就要尊重不同宗教信仰和习俗。郑和是穆斯林，但他十分尊重佛教和道教，甚至还参与这些宗教的活动。在 1409 年访问佛教之邦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期间，郑和特地向当地佛寺布施大量供品，并立碑纪念。这是他获得所访国家人民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马来西亚华族非常注意将在纪念郑和的活动与尊重当地主流社会宗教、习俗结合起来。丁加奴的三保公庙的情况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

如果说，马来西亚马六甲的三宝亭、槟榔屿（即槟州）和砂劳越的三保公庙都位于华人聚居的地区的话，那么丁加奴的三保公庙恰恰座落在马来居民的村落——诺来村。1997 年该村已属于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管辖的地区。而进庙烧香供拜、求签占卜的却几乎都是非穆斯林的华人（在马来西亚华人中穆斯林很少）。诺来村村长（马来人，穆斯林）重视三保公庙，特委派住在与该庙相邻的一位名叫阿卜杜拉·伯吉的马来人，协助照

管三保公庙。无论三保公庙管理委员会还是前来上庙的华人都与这里的马来村民关系十分良好。这些都表明：不同宗教信仰的族群，只要相互尊重，是完全能够和睦、融洽地相处的。同样，在世界上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或族群，也需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注释

- 1 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都抵满刺加。郑和“五次驻节马六甲”，是指他第三、四、五、六和七次下西洋期间访满刺加。其中第三次下西洋时抵满，是在1409年。冯承钧校注的《瀛涯胜览》满刺加条称：“永乐七年己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以下似脱宝船二字）。赍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刺加国。”按此记载，1409年郑和作为正使访满，当年满刺加建国。这也是郑和首次驻节满刺加。
- 2 耽兰洲一说为吉兰丹，一说是 Tantalum。
- 3 蒲罗中，又作蒲罗中国、蒲芦中或略为蒲罗。“蒲罗”为马来语 pulau（岛），“中”为马来语的 hujung（尽头），合起来的意思是（马来）半岛的尽头，指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柔佛一带。也有人指泰国的佛统（Nakhon Pathom）、北大年（Patani）或万伦（Ban Don）湾一带。见陈佳荣与谢方（1986）。
- 4 乌文又作乌茶、优钹，为 Udra 或 Odra 的译音，在印度东岸的奥里萨（Orissa）邦；一说为印度的安达曼（Andaman）群岛。也有的主张在马来半岛。
- 5 丹丹又作旦洲，旦旦、单单或误为日亘。多数学者认为它指马来西亚的吉兰丹。见陈佳荣与谢方（1986）。
- 6 一般认为盘盘在今马来半岛北部。见陈佳荣与谢方（1986）。
- 7 多数学者认为它指狼牙修、狼牙须、愣伽修、郎伽戌和凌牙斯、凌雅斯加、凌牙犀角等，均为同名异译，在马来半岛北部。宋以前领土较广，包括今马来西亚的吉打。见陈佳荣与谢方（1986）。
- 8 赤土国在狼牙须国的南面。“当时赤土国的疆域，包括今天的玻璃市、吉打、威士利、霹雳和吉兰丹等，都城在今旧吉打”，见林远辉与张应龙（1991）。“一说赤土即羯荼的同名异译，在马来西亚的吉打州一带，该地四世纪梵文碑铭有 Raktamritika 一名，意为赤色、赤土，与吉打音义双关”。见陈佳荣与谢方（1986）。
- 9 传说郑和船队航行途中，宝船船底突然有洞，海水涌入。在此危急时刻，一条鱼游至洞口，用鱼身堵住窟窿，使宝船安抵马六甲，见林远辉与张应龙（1991）。郑和怀着感激之情，将该鱼捧起，放回海中。从此这种鱼身上留下郑和手印，故称“三保鱼”。在马来文中这种鱼叫“ikan talang”。见杨贵谊与陈妙华（1988）。
- 10 1997年8月17日，马来西亚副首相在郑和纪念展开幕式的讲话中也提到了汉丽

宝。他说，当年郑和曾护送中国公主汉丽宝抵马六甲。他风趣地问：这次前来马来西亚参加郑和纪念展的云南代表团团长高发元教授是否也护送中国公主来了？

- 11 又例如传说燕窝最初是由郑和的部下从加里曼丹岛北部带到中国的。在《郑和航海图》绘有加里曼丹岛上的地名，如铜鼓山。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勃雷 (Francois Debre 1982) 称，郑和船队 5000 官兵在婆罗洲 (即加里曼丹岛) 北岸登陆后，曾向当地居民学习采集燕窝煮汤以强身。这里指的婆罗洲北岸有可能是今日马来西亚的砂劳越或沙巴，因为砂劳越和沙巴位于加里曼丹的北部。不过，这仅仅是一种可能。郑和官兵在婆罗洲北岸登陆一事，中国古籍上没有记载，但不排除郑和船队的分遣队航行至婆罗洲北岸的可能性。法国学者的上述故事需要进一步考证。

参考书目

- 陈佳荣与谢方 1986。《古代南海地名汇释》。新加坡：中华书局。
- 弗朗索瓦·德勃雷 (DEBRE, Francois) (赵喜鹏译) 1982。《海外华人》中译本。北京：新华出版社。
- HARUN Aminurrashid 1969. *Peristiwa Laksamana Cheng Ho ka-Melaka*. Singapura: Pustaka Melayu.
- 简斋 1960。〈汉唐的陶瓷器〉《南洋文摘》，第 12 期。
- 孔远志 1990。《马来西亚的三保山与华人》。北京《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 2 期。
- 赖观福 1984。〈世界保存历史古物的趋势〉。《星洲日报》，7 月 23 日。
- 李业霖 1984。〈青山亭和三保山的历史〉。马来西亚《星洲日报》，7 月 23 日。
- 林远辉与张应龙 1991。《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林源瑞 (无出版日期)。《历史之城——马六甲》。(单行本)
- 马欢著，冯承钧校注 1955。《瀛涯胜览》满刺加条 (原著 1451 年成书)。上海：中华书局。
- Sejarah Melayu* 1982. Kuala Lumpur: Fajar Bakti (第八版)。(原著 Tun Sri Lanang, W. G. Shellabear 译)。
- 沈墨义 1984。〈三保山耶？抑或三宝山耶〉。马来西亚《南洋商报》，7 月 9 日。
- 温斯泰德 (WINSTEDT, Richard O.) (姚梓良译) 1974。《马来亚史》*A History of Malaya*。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杨贵谊与陈妙华 1988。《马来语大词典》。新加坡：世界书局。
- 张燮著，谢方点校 1981。《东西洋考》(原著 1617 年成书)。上海：中华书局。